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

刘森林 ● 主编



[美] 麦卡锡 (George E. McCarthy) ● 著

马克思与古人

古典伦理学、社会正义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

Marx and the Ancients:

Classical Ethics, Social Justice and Nineteenth-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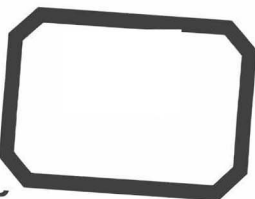
王文扬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
Classici et comm

HERMES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
刘森林 ● 主编



马克思与古人

古典伦理学、社会正义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

Marx and the Ancients:

Classical Ethics, Social Justice and Nineteenth-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美] 麦卡锡 (George E. McCarthy) ● 著

王文扬 ● 译

4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与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正义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美)乔治·麦卡锡著;王文扬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4
(经典与解释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

ISBN 978-7-5617-8414-3

I. ①马… II. ①麦…②王…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1333号



VI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Marx and the Ancients: Classical Ethics, Social Justice and Nineteenth-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By George E. McCarthy

Copyright © 1900 b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8—214号

经典与解释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

马克思与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正义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

(美)麦卡锡 著

王文扬 译

责任编辑 万骏

封面设计 吴正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12.25

字 数 305千字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4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414-3/B·610

定 价 44.8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出版说明

贫瘠的园地造就贫瘠的思想，肥沃的园地孕育高深的思想。马克思的思想之花是在吸收了西方古今丰厚思想营养的基础上孕育和绽放的。许久以来，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和三个理论来源的说法影响甚广，似乎马克思的思想根基主要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国民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理论相关，只要弄懂了这三种思想，就能确切把握“只有三个部分组成的思想体系”。这种看法无视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思想、基督教传统乃至 18 世纪末兴起的浪漫主义对马克思心灵的滋养。我们忘记了，马克思曾在标志性的“博士论文”中明言，自己要“联系整个希腊思想，详尽阐述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在马克思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名言与特拉西及法国国立研究院主张的以社会科学启蒙民众、改造世界的激进思想之间，在德国早期浪漫派倡导的“存在先于意识”与马克思主张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之间，以及在马克思的一些思想与卢梭的一些思想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和类似。可以说，没有从古到今的众多思想的滋养和熏陶，仅靠三个来源是熏陶不出我们“熟知”的那个马克思的。

马克思进入汉语思想界已有百年之余，本土化的成果、实践，

甚至与这种本土化同时发生并相互对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偏偏生养马克思的西方思想传统一直没有得到足够多的重视,其实,西方学界同仁在这个园地里的辛勤耕耘已经收获众多成果。理解一种思想,就要掌握和重建孕育它的丰富资源,内心亏空和贫瘠的读者难以读出作者通过文字表征出的诸多义涵。马克思这个作者仍然在向当下的中国诉说,如果我们没有努力接近马克思的学术素养,尤其欧洲的古典素养,我们不可能做一个合格的马克思的读者。

离开西方古典思想,离开西方传统思想,无法贴切地理解马克思。有鉴于此,在中山大学 985 二期创新基地“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明·现代文明的哲学基础”的资助下,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马克思与西方传统系列”,以马克思与古典思想的关系为主,兼及马克思与现当代思想的融通,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贡献微薄之力。

刘森林

2007 年 5 月 10 日晚于中山大学康乐园

目 录

导言 / 1

本书概要 / 11

第一部分 古人 / 23

第一章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自然哲学：马克思与伊壁鸠鲁 / 25

第二章 认识论、政治学和希腊城邦中的社会正义：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 / 75

第二部分 现代 / 159

第三章 19世纪德国的回归社会伦理学与古人：康德与黑格尔 / 161

第四章 古人、民主与马克思的古典自由主义批判 / 221

第五章 元伦理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与李嘉图 / 269

第六章 马克思的伦理学和社会正义理论：走向一种唯物主义的真理共识理论 / 317

导 言

从高级中学的早年岁月开始,直到其完成大学学业为止,马克思一直沉浸在古典文化和哲学的熏陶当中。从他最初对希腊罗马的历史与神话学的兴趣,到他完成论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物理学的博士论文,古典哲学构成了他理智生活的核心。本书的目的是要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和伊壁鸠鲁哲学的特别关照,以此来检视马克思广泛兴趣的几个方面。本书将展示希腊人的价值和典范如何影响了马克思后来关于社会正义、共享民主的理念,以及他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事实上,本书认为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他的经济危机理论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正确理解,最终都离不开其基于希腊城邦典范的关于社会公正的设想。除非正确评价伊壁鸠鲁的幸福与自然学说,或者亚里士多德的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学说,否则马克思后来分析李嘉图、斯密和马尔萨斯等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将会溜走。也许听起来很不寻常,即马克思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的分析只有置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的文本背景中方有意义。而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中,本书才得以切近地考察马克思的伦理学和社会正义理论。

过去几年里,马克思与伦理学的主题讨论业已风靡北美。一些新的著述已就马克思是否有伦理学说抑或社会正义理论作出大量分析。在它们当中,大多都存在这样一个毛病,即那些问题都是从一个文化真空中提出来的。虽然它们都展现了严密的诠释学问,只可惜还是没能深入去考察马克思思想发展所立足的哲学背景与传统。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研究仅流于对马克思话语的泛泛之论,而遗漏了赋予其话语以意义和关切的潜在精神。通过考察希腊哲学的古典伦理学和德国启蒙运动,本书将对马克思思想所建基的深层结构和传统加以检视。马克思在试图将古人的典范和标准整合到其对现代政治经济学之结构和价值的批判当中时,他便深陷于古代人与现代人的两个世界之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和《资本论》(*Capital*)中,他剖析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结构、工场、经济体系的危机以及自由主义制度形式的发展过程。但令他尤为感兴趣的是那些产业资本主义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现代意识的形成过程——理性、自我意识和自由在现代社会中的真正可能性。

从论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博士论文及其对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批判开始,进而扩展至其后来的历史著作,马克思将希腊社会生活的伦理典范和价值观念融入进了他对现代工业社会的理解和评估当中。马克思处于工场现代化和新阶级制度、抽象劳动模式形成的半途中,一方面,古典传统迫切渴望平等、共同体和社会正义,另一方面,后面这些价值观念不是仅仅死板地照单全收,而是在18世纪的政治哲学和法国大革命激发出了个人自由理想和人权保护意识之后,这些价值观才转而得以整合并转化。

更深入地考察古人们,将有助于解开马克思如何看待唯物主义、科学、伦理学以及社会实践的一些奥秘。当然,这些范畴如若经过古典传统过滤,则对它们的诠释将会截然不同,无论如何总比经法国启蒙运动的机械的、决定论的唯物主义和史无记载的乐观

主义及英国政治经济学过滤为好。通过整合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自然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对伦理学之为科学的批判及其社会正义理论,马克思在一个全新的方向发展了经济学理论。惯常的诠释套路往往采用唯物主义和笛卡尔(Descartes)、霍尔巴赫(Holbach)、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斯密(Smith)和李嘉图(Ricardo)等人的方法来阅读理解马克思,较之此等套路,古人则为马克思的读者提供了一幅洞察其进路的明显不同的图景。

随着把马克思主义的根基扩展到包容古人,也就产生了对一些特别复杂问题的更宽阔、更全面的理解。这些问题部分包括:(1)马克思对民主、个体自由、人权以及个人发展看法的丰富性;(2)对他批判自由主义和现代性的更深刻的理解;(3)对他极其不同于斯密和李嘉图之劳动价值理论的价值规律的历史解读和伦理解读;(4)科学和伦理学的整合(伊壁鸠鲁);(5)另一种不同知识观的提出,它基于对自休谟(Hume)、康德(Kant)和黑格尔(Hegel)等人发展而来的科学和实证论的批判,而回归至伊壁鸠鲁和亚里士多德;(6)“理论与实践”的应用作为马克思对“客观有效性之两难”的认识论回应及其对科学、认识论和基础主义的批判;(7)放宽我们对马克思“实践”概念运用的理解,使其不但包括理论、劳动和艺术(黑格尔),还包括民主国家中的政治和伦理活动;(8)回复到一种基于民主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唯物主义的真理共识理论(consensus theory of truth);以及(9)把经济学、政治学和道德哲学重新整合到一种社会伦理学当中,就像在古人那里曾出现的。

美国当代讨论马克思与伦理学的著作,大多都集中围绕着一个非常狭窄的道德哲学定义,即把道德哲学还原为个体的道德决策问题。这一点与那些对现代哲学和宗教传统的偏见相符。由此它也就径自不用去考虑那些非当代的伦理视角,包括古典伦理学的实质内容与典范,及其元伦理学(metaethics)的社会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据此定义,马克思没有道德哲学,因为他所依赖的是一

种与现代传统截然不同的视角。而一旦将此联系到他对资产阶级的道德与意识形态的批判时,则其理论中更无任何道德学说的容身之所了。最后,随着人们普遍接受将其后期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理论诠释为科学性与实证性,便由这样一种接受完成了此论调的最后一击。这一来也就排除了接纳一种非科学的评价标准。而诸如此类观念一旦形成并广为接受,那就很难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为伦理学说找一个相应例子了。

而即便是在那些对马克思的诠释更为细致,同时也不把马克思简单还原成一个庸俗唯物论者的人们那里,也依然普遍认同在马克思早期的哲学著作与后期的科学著作之间存在着裂隙。批判理论家们更乐意强调马克思辩证的和哲学的进路,而非其经济学和科学的视角。这一做法向现代性所作出的让步已经超出了马克思本人乐意接受的程度。对道德与科学过于狭隘的定义导致了对马克思的研究和评价的一个根本错误。将马克思置于亚里士多德和伊壁鸠鲁的传统中来看,道德是与社会伦理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结合在一起的。清新空气穿透僵化的现代视角。这一新观点实质性地突破和超越了现代道德,拓宽了我们对伦理本质以及古典伦理于现代情境中之适用性的理解,与此同时也扩展了我们对马克思本人之社会分析的正确评价。

在之前的关于马克思批判认识论与科学的著作中,我试图展示他不能也不想将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运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①通过考察其政治经济学中概念与理论形态的三个不同层次,显明了对马克思实证论诠释既不足够,也不恰当。正如在《资本论》中找到的这种批判性、历史性科学,其所具有的方法论、本体

① George McCarthy, *Marx' Critique of Science and Positivism: The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Dordrecht,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

论与世俗三个不同维度,揭示了一系列与一门实证科学所需要的截然不同的优先性、方法与目的。事实上,《资本论》中并没有一种确切观念关乎可预见之未来(时间)、关乎决定论式与机械式唯物主义(本体论),抑或是关乎一种现实拷贝理论(方法),相反,它有的是一种建基于历史分析与辩证批判的方法。在其早期与晚期著述之间并不存在断裂;事实上,正是作为“批判”之哲学,告知了我们马克思理解和使用“科学”一词的实质所在。^①在写作后期的经济学著作时,马克思清楚意识到认识论问题与现代科学的形成及其正当性问题紧密相连——即所谓“客观有效性之两难”。这是观念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历史——的问题,是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的哲学论证。而在社会理论中危如累卵的是理论与本体论之间关系的本质以及对一种优先的探讨模式的发现,这种探讨模式或凭借经验性现实,或凭借演绎性观念,以允许就我们对世界的经验和知识这些真理宣称的正当性作出论证。到达真理的优先进路及其或以经验论形式或以唯理论形式作出的知识论论证,这些在休谟的批判科学继而在黑格尔批判知识论自身之可能性之后都已经成问题。

在细致考察《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所运用的知识论与方法后,否决从实证论角度解读马克思这一点一旦确立下来,那么接下来讨论主要问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也就完成了。如果马克思在这两本著作的其中任何一本当中都未曾使用实证方法,那么他是在干什么呢?如果《资本论》原意并不是要解释经济危机、预言社会崩溃或确定特殊价值和商品理论,那么其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何在呢?如果把马克思著作置于18、19世纪批判科学和基础主义的框架下来阐释,则他的辩证法将呈现出全新的意义。

^① Patrick Murray, *Marx's Theor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tlantic Highlands, N. J.: Humanities International Press, 1988).

当所有出自归纳或演绎逻辑的优先表述都遭到拒斥,通向真理的道路由此被封锁之时,黑格尔和马克思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具体的普遍性和社会的整体性。“一个事物的存在是其变成另一事物并且统一自身与其他者的整个动态过程。要了解某物,唯有通过了解其发展过程——历史。正是这一运动或力量构成了一个实体的真实性。”^①辩证法被用于揭示历史现实的结构,揭示它们内在的伦理矛盾及其社会制度间的有机联系。

马克思的后期著作是他理解历史和社会关系的产物,此二者奠定了其伦理理论与社会正义理论的基础。^②对实证论的批判帮我们清除了所有障碍,使我们可以从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些著作,也使我们认识到古人在哲学上的重要性。后者真正的重要性唯当马克思著作的科学位置被连根刨除之后才能显露出来。德国对实证论的批判一旦与希腊、德国的社会正义理论和典范结合起来,那么伦理学便以一种崭新的方式与科学融合,这种新方式要求对马克思后期的政治经济学作出更为细致的注解。在批判认识论和科学并且寻求新的方法来证明知识和真理宣称的正当性的同时,必须重新反思传统的那些阐释,它们在对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两人在认识论、实践以及政治学看法上存在根本分歧。在德国社会理论中,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与马克思的实践观相对立这一点几乎是自明之理。同是一丘之貉,对于这一点也须加以严肃质疑。

通过批判现代科学以及重新将古人纳入到现代社会理论当中

① Norman D. Livergood, *Activity in Marx's Philosophy* (The Hague,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1967), p. 4.

② 本书通篇将把社会正义诠释为更宽泛的社会伦理理论的组成部分,而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历史结构分析)将被视为更广阔的社会理论视野(分析共同体、交往行动、意识形成、社会政治价值、自我实现和人类解放的可能性以及民主)中的组成部分。

之后,还需要反思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还有他对人权、民主和个人自由以及——最终——政治学与认识论间关系的看法。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后期的经济历史著作代表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批判与资本主义的全面伦理批判的综合。虽然也有一个规范性批判贯穿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但却是在《资本论》中,伦理学才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内在矛盾统合起来。《资本论》绝不仅仅是一部劳动价值理论的著作,也不仅仅是一部预言经济崩溃的著作,更不仅仅是一部价格决定理论的著作;这一著作毋宁代表了对现代性之深层结构——个体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所不可逾越的界线——的历史分析和辩证呈现。

从其更早期的著作开始,马克思的批判性方法的目的就从未改变过。“宗教批判以这样的声明终结,即对人而言人是最高存在,因此宗教批判也以这样的绝对命令终结,即人在其中成为一降格的、被奴役的、被忽视的、可鄙的存在的一切条件都必须颠覆。”^①“社会生产关系,科学技术在物质生产中的应用,阶级组织与异化劳动的本质,基于抽象劳动和剩余价值的经济体趋向于过度生产、消费不足、比例失调以及利润率下降的宏观经济特征,所有这些研究都是伦理和社会公正的总体性理论的组成部分。伦理与社会公正深埋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体系之中。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他提供了社会要素,其中,绝对命令失去了其对社会现实的抽象性,从而开始具备具体的历史形式。马克思为进一步深入黑格尔的康德批判准备好了唯物主义的根基。只有在社会制度的具体情境中,道德才对个体有意义。如果这些制度阻碍或者破坏了理性的自我意识行动的可能性,那么道德本身也就变得不可能。对马

① Karl Marx, “Toward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 Introduction,” in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ed. and trans. by Loyd Easton and Kurt Guddat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67), pp. 257—58.

克思而言,一个压迫性经济体中的社会关系是阻碍了个人自由与理性行动发展的。

虽然黑格尔的康德批判是这一观点的最直接形式,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实质与方法的伦理根基却在古人那里。真正的问题是,马克思从未以一种传统的哲学方式来清晰地表述这一理论。同样,因为其伦理学与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理论捆绑得过于紧密,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当代哲学家不习惯把它们放在一起考察。再加上他在后期的每一部新著作中都运用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这也使得难度进一步加大了。即便仅仅是在《资本论》中,“批判”也有七个明显不同的层次和涵义:规范批判、内在批判、拜物教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辩证批判、历史批判以及作为危机理论的批判。所有这些全都交织在他的理论中,且各自都基于不同的方法论传统和伦理传统——有的源于自由主义,有的立足社会主义,或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等。《资本论》中最奇特的方法就是同时将社会伦理学与政治经济学并置入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辩证法)的具体情境当中。以此形式,马克思早期著作所用的异化概念(规范性批判)跟他分析工场中的剥削以及一个危机四伏的经济体系的非理性也糅合在了一起。它从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开始,而终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危机。辩证法将政治经济学分析转换成了对历史发展与现代社会组织的批判。这是出现在价值规律当中的真正转换。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是因为它扭曲了人类发展并且碾碎了个体的潜能(亚里士多德);它创造了一个关于自然法与经济神(economic divinities)的超越世界,超出作为个体的人的掌控(伊壁鸠鲁);它将历史与人类的生产(对象化与外在化)变为盲目之天命和更盲目之委身的崇拜对象(伊壁鸠鲁与希伯来传统);它摧毁了人类理性、道德自治与自我决断(卢梭与康德);此外,它还导致了扭曲的自我发展与错误的意识(黑格尔)。所有这些都是对贯穿

马克思整个著述的实质伦理的威胁。因此,《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学和逻辑学批判,它建立在马克思前所未有地采纳了古典社会伦理学三大主要传统的基础之上:古希腊城邦典范、希伯来先知以及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观念论。^①这些传统的整合为马克思预备了一个伦理架构,由此可以对资本主义进行评估与道德批判。因此,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与其说是一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毋宁说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资本的伦理批判以及与此相联的要求社会变革的道德命令。

很显然,马克思著作的主体部分并非关乎伦理学,而关乎元伦理学。马克思伦理理论的多数内容都以这些哲学传统作为预设,而在他耗费大量光阴心血来澄清经济领域中的社会支配结构时,情况尤甚。如果一个经济体不能实现其自身的自由、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标准式理想;如果它不能带来经济理性与社会繁荣;如果它的科学技术被当作机械系统而用于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更深层的社会控制,那么这一系统即便置于其自身的标准之下也是非理性的(内在性批判)。本书首先将通过分析来拆解这些不同的理性传统以及它们对马克思伦理理论的各自贡献,然后在最后一章又将它们重新整合进一个总体的社会正义理论当中。本书分三个主要部分来具体讨论古人、现代人及其在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综合。这一综合赋予我们灵光,以洞见马克思的后现代批判。

^① 《申命记》和《利未记》中的《摩西法典》以及先知传统,同样是古典伦理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马克思融合了希腊、希伯来和现代德国的典范。然而,对马克思与这一传统的渊源的考察工作则留待另一专著来完成。

